

2108



第十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
劍閣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目 录

剑阁土改片断回忆	苗满山 (1)
接管剑阁金融机构及建立人民银行	张鸿春 (10)
接管剑阁建立县人民政府的工作回忆	刘成基 (16)
南下剑阁接管财政工作	白宇清 (20)
回忆我在县农协会工作	田金玉 (25)
剑阁县人民政府建立之初	方经源 (29)
剑阁抗美援朝工作回忆	陈德禄 (32)
赴朝慰问亲历记	梁树森 (40)
翻身农民组织起来的农协会	王纯武 (48)
我所经历的清反减退工作	孙季先 (51)
土改中的人民法庭	谭万祥 (54)
回忆解放初期工作二三事	蒲希丛 (58)
军 阀 混 战 到 防 区 制 点 滴 见 闻	李竹溪 (61)
民 国 年 间 剑 阁 史 事 琐 淡	唐公衡 李龙生 (63)
忆 鉴 泉 先 生 北 游 剑 门	赖子畴 (73)
民 国 年 间 剑 阁 商 业 市 容	赖子畴 (89)
剑 阁 田 赋 改 征 物 实 及 其 内 幕	杜全庄 (97)
清 末 民 初 剑 阁 体 育 活 动	郝元龙 (102)
忆 少 年 时 期 “溜 圄 子”	刘作藩 张云福 (105)
防 区 制 时 期 剑 阁 工 业 生 产 状 况	何 成 周 调 查 整 理 (111)

石状元赵兴昌轶事	何成周 搜集	(119)
民国时期剑城庙会	邹培林	(124)
民国时期见闻点滴	郑杰生	(127)
剑阁水码头——张王庙	何成周 纪叶珪	(131)
饮食服务业职工的新旧生活	纪叶珪	(135)
两起难忘的事	唐幼康	(137)
一个教育世家的兴衰	王全甫	(141)
红军渡江见闻	李树宣	(147)
还乡团血腥罪恶一例	夏成	(150)
抗日战争至解放初见闻片断	胡捷先	(155)
周恩来途经剑阁(补述)	王汉章	(161)
普安小学的由来	邹培林	(166)
抗战时期剑阁县级以上机关建置	王守义	(169)
脉络相联的剑阁地方权势之争	王全甫	(175)
冯天祥之死	雷雨农 何绍本	(182)
刘琴西、母平章的政治活动及其末日	罗孝整理	(187)
刘琴西外传	孙季先	(193)
民国年间剑城的害人虫——母文宗	邹培林	(198)
分赃不均 官匪失和	简仕祥	(202)
琐事拾零——剑平师管区另一侧面	程彦玕	(206)
自然灾害亲历记	何绍本	(210)
一贯道在剑阁的活动	王炎生 张元熙	(212)
对有关土匪杨树五两点讹传的更正	王守义	(217)
更正与质疑	罗锦成	(219)

剑阁土改片断回忆

苗满山

千年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在川北行署辖区内，一九五〇年秋首先于三台县试点改革，接着在中江县进行第二期土改，再到剑阁开展第三期土改。在整个川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中，我都一直参加这一工作，先任工作团中队长，后来相继任分团长，具体领导所任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一九五一一年秋，到达剑阁进行这项民主革命，是紧接剑阁“清反减退”运动，开展土地改革的。

(一)

剑阁土改团在川北区党委的领导下，由川北区党委土改团及本县经过培训的农村工作人员组合而成。李登瀛同志任总团长，下分几个分团，我和刘成基同志分别担任白龙、金仙分团团长。在一九五一年秋收后，我团进驻金仙区，各分队，小组分别下乡下村，与农民协会配合，一面广泛深入宣传土改政策，一面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提高农民阶级觉悟，健全农协组织，发展农民自卫武装力量。严格掌握政策原则，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对地主给以出路，按政策没收其应予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对恶霸地主、反

革命分子按他们的罪恶轻重、民愤大小，分别予以依法制裁。

土改一开始，我们就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常常挤出时间，深入学校、深入群众和知识分子、老农之间，特别是步入苦大仇深的老实农民家下，摆谈情况。深有感触的是，一些苦大仇深的农民，他们是勤劳朴实，言谈无虚的，但又顾虑最大，颇难发动。当我结识到曾于一九三五年参加过红军的一位贫苦农民郑钦贤时，发觉他很熟悉地方情况，而且憨厚老实。因此我常和他一起摆谈，有些会议也邀请他参加。他对当地的土改，是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位憨厚的老人就是郑成功、郑成明的父亲，现在红军院休养。

我们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激发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民撑起腰来，积极投入运动。同时也严防投机和不纯分子，伪装积极，妄图达到个人目的，千方百计混进农协组织，搞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事情。并且十分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我们一道工作。

曾记当时，我团任分队长的同志：金仙是弋泽笃、复兴是张治平、香沉是昝一中、吼狮是×××、涂山是阎××。当工作开展不久，就了解到香沉分队长昝一中，有作风不正行为（在当时立场不坚定，警惕性不高的同志，往往容易受地主“美人计”的骗），我当即撤了昝一中分队长的职务，另换一位民盟成员肖郁文接任分队长。肖顾虑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又不好表示推辞，我说：“老肖，我了解你的，你有这个水平和能力，你是大学生嘛，民盟是我党统一战线的朋友。党的事业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共同完

成任务。我相信你是可以胜任分队长这个职务的，你就不用推卸了吧，大胆放手地去工作！”事实证明，香沉乡的土改工作，在肖郁文的具体领导下，干得很有成绩。

(二)

在惩治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阶段，根据公兴乡上报恶霸地主何禹生的罪恶材料，要求枪毙以平民愤。当时何禹生之父何思聪已扣押在县，何禹生也扣押在乡，只等审判。在我看了上报何禹生的材料，有感他累累罪恶，是杀不容宽，于是批了“同意枪毙”，报经上级批准，即时进行公开审判，执行枪决。

及至通知全区，在公兴参加召开的公审公判大会时，布置森严的会场里，挤满两三千人。各乡的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都已带到，枪毙何禹生的亡命牌子也写好了，刑场事项都作了周密安排。

大会开始，我于主席台审判长席位就坐，台下广大群众不断高呼口号。当传唤“带分子入场”，特别是传“带恶霸地主何禹生入场”时，全场一派“打倒……打倒……”的口号，声声震荡山谷。在何禹生被拖向主席台下的时候，我就一直注意此人的相貌，看来有点书生气味，特别是面无胡须，年纪不过三十岁左右。顿时引起了我的疑思：一九三五年距今十五六年，彼时的何禹生当是多少岁？能干出杀人的事吗？当何禹生站稳台下时，我就首先注意问他的年龄，在他说出“二十八岁”时，我有所不信，翻阅上报材料系“三十八岁”。于是我生气地说：“胡闹，你明明是三十八岁，为什么说出二十八岁？”他再次申辩：“我确实是二十八岁！”

“可有人证明？”我问。在场的一个老人站立起来说：“他和我的二娃是老庚，我二娃今年为二十八岁。”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这老人说：“我叫何思周，是他的远房族亲叔老子，因此我知道他的年龄。”

接着我继续追问何禹生，“群众揭发，一九三五年在红军走后，你杀过红军游击队长，还杀害过参加苏维埃的贫苦农民，坦白交待！”

何禹生并无惧色地回答：“我并没有杀过人！一九三五年我父亲当大甲甲长，为保正熊国元、大地主苟子成出力。后来我父亲被他们提升为袍哥大爷，红军来剑时，有个姓尚的游击队长，带领参加苏维埃的农民，抄过熊保正、苟子成的家。红军走后，我父亲受熊国元、苟子成的差遣，杀过游击队长，抄过农民的家，进行报复，或许是有，但我那时年小，现在是说不清楚的。我确实没有杀过人，请求调查。”

这时我目光转向在场群众，宣告请当年受害亲属及揭发人出场作证！上前控诉！一时人群小有移动，但并无人前来作证，也无人控诉。只有会场中发出“揭发人没有到会”的回响。我再问何禹生：“群众揭发你抄过农民的家，还烧过人家的房屋，你要老实交待！”何禹生依然面无愧色地说：“那是我父亲所为的罪恶，我没做过这些事情！”我再次召唤受害人、检举人出场控诉、揭发，一时还是没人上前，又同样听到“受害人、检举人都没到会”的回音。

我沉思之下，再翻下面所报材料，续问：“何禹生你解放前，带上帮凶、打手向佃户逼租，讨债，老幼妇女向你磕头求情，望你宽恕，你不但不肯，还支使一些狗腿子去估打催讨。还有揭发你奸淫妇女、仗势称霸一方，欺压群众，这些

罪恶，是不是事实？”他颇有惧色的愧称：“这些罪恶我是有的，愿认罪认罚。”

此时此刻，我想到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对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一向是按其罪恶轻重不同，分别依法治罪。何禹生的罪恶，应受惩治，论其事实还不属死罪。于是我当场拍板，叫人将何禹生暂押下去，待后进一步核实再审再判。在干部、群众惊疑交错的时候，我毅然宣布转入检举揭发审判其他罪犯程序。

会毕我当即找来上报何禹生罪恶材料的工作队，经了解情况，原来所报材料，都是汇集大小不同群众会议上的反映。细核实况，何禹生之父何思聪在一九三五年前后，是当地团保的贴心爪牙人物，受任有似后来的保长一样的大甲甲长，又当袍哥大爷，狐假虎威作恶一方。红军走后他为地主豪绅效力，欺压农民，特别是受人支使杀害过游击队长，吊打过贫苦农民。清匪反霸斗争中，已被群众解送县上要求法办。其子何禹生高中毕业后，任过碑垭中心小学校长、县田粮管理处公务员、碑垭乡副乡长，虽无血债，也有一些罪恶和民愤。当地群众对他父子两人都有仇恨。在土改期间的诉苦会上，群众对他家的作为，多有深仇大恨，倾诉苦水。镇压恶霸地主阶段，各工作队在上报典型材料，公审公判以壮土改声势时，下面竟将他父子两代的罪恶列为何禹生一人材料之内。把本来报写何禹生的年龄二十八岁，在“二”字上添了一横成为“三”十八岁，以说明他解放前能干出那多的罪恶，要求予以枪毙。分团按所报材料批了“同意枪毙”，总团批准公审公判执行。

当时土改分团长，也是人民法庭的审判长，既经上级批

了下来，我当立即照办。可是我在公审公判何禹生一案时，初问由于发现年岁有疑，继而发现其罪恶事实大有出入，因而拍板停判。虽然有违上级安排和执行“枪决”的任命，但我一经发现有错，按照实事求是的政策原则，不能将错就错，现场纠正，未予执行。正当电话汇报情况，总团长李登瀛同志接电，首先问我：“你们今天的公审公判大会开得怎么样？”经我说明上述情节，提出“何禹生父子二人的罪恶，应当严明分清，不能父罪子偿。按何禹生的罪恶，不该枪毙，只应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故此现场违令，请上级重作决定。”我满以为会受批评或难以预计的处分，可是李团长听完之后，即赞扬地说：“这件事，你处理得好！是嘛，人头只有一个，杀错了就难办。照你的意见纠正执行！”事后何禹生依法改判有期徒刑五年；其父何思聰判死刑缓期二年。

(三)

一九五二年春，剑阁土改结束，转入复查阶段，彼时我留在剑阁任县长。一日仁和区汇报二洞乡油房沟有“小台湾”之称，那里的反革命谣言颇多，生产混乱。有一富裕中农之家，夫妇二人，一夜之间同时吊死在一棵树上。我当即前往调查处理，原来油房沟在土改复查中，当地农协会有见被吊死的这家生活过得较好，竟将他家在土改时所划的富裕中农成分，改为地主成分，随之通知他夫妇二人开斗争会，一面进行斗争，一面抄了他的家。会完夫妇二人回到家里，见衣物粮食都被搜光，当晚出门吊死。这件事情发生后，群众极为不安，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谣破坏，煽动群众说：“人民政

府的政策变了，成分还要重划，大家该吃的就吃，该用的就用……。”全村的群众，家家户户，杀猪杀鸡，大吃大喝，买东西乱成一团，秧把子田里田盖到处乱甬，连秧也不裁了。

经过调查结果，此事是那个村的农会主席一手造成的恶果。原来这个农会主席，虽是一个穷人，但他解放以前，一直是好逸恶劳，曾多次当土匪抢人。解放以后伪装积极，混进农会组织，又谋骗群众被推为主席。他当上主席以后，就以权谋私，拉拢一些不纯分子，胡作非为。为了想多得一点“胜利果实”，竟擅改农民成分，特别是对那夫妇二人吊死的这家，发泄他解放以前，求助不绪的宿怨，乘土改复查期间，借机报复，背着区乡政府和工作干部，利用自己是农会主席的职权，把这家原划定为富裕中农成分，改划为地主成分，并采取突然袭击，私自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无情斗争，同时没收了他家的财产。及至查明底细，群众反映这个家伙，混入农会后，独断专行，简直跟国民党的乡、保长一样，称霸一方，所以有“小台弯”之说。

全部情况一经查明，除了将死者家庭成分照原富裕中农不变，被没收的财物一律追还，其子女交由族亲照管外，还向群众讲明，党的政策并没有变，鼓励大家勤劳致富，恢复生产秩序。当众宣布撤销这个胡作非为分子的农会主席职务，另行改选主席，对混入农会的坏分子，一律逮捕法办。就此，群情振奋，人心安定下来了。

(四)

回忆我在剑工作期间，启用民主人士，关注知识分子工

作外，还常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如石光熙、赵尧夫、赖子畴、谢秀夫、任俊臣、王炳如等邀好，有一次还发出通知，请全县范围内老秀才一类的知识老人，来县上座谈，并亲自带领他们参观县人民政府。老人们自始至终，没不畅所欲言，喜笑颜开。其间曾听他们交口赞谈：“过去县政府的大堂、二堂，那许我们进出行走，今天不仅大门敞开，欢迎我们座谈、欢迎我们参观，而且县长还以宾客相陪对待我们，这真是梦也没梦到过的荣幸。”

(五)

我在剑阁土改及主持县人民政府工作的几年中，至今记忆尤新的是每多思考古人所云：“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的道理，深感算为至理名言。就我的理解，凡是以权谋私，干出违反党的政策原则的事情，这等人都是犯了私罪，是完全不应当有的行为；凡觉察到自己或下级、上级，在执行政策，制订方案上，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则须当敢于公开纠正，毫不留情给予指责。即使是我的上级，也要直言不讳，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反映下面的真实情况，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办事。其间虽在某种情况下看来，有损自己的尊严、有伤下级的脸面、或者说有顶撞上级的情况，得罪“公婆”，这都是为公而开罪于人的事。这样的公罪，就不应有什么顾虑，那怕自己丢官坐牢，也在所不惜。正如彭德怀同志，在某个时期，很不赞同毛主席的主张那样，如此公罪是无所惧的。我在执行“枪毙何禹生”的那一问题上，一经发觉材料有误，毅然决定，没按上级批示办事，根据复查，实事求是改“死刑”另判有期徒刑五年的决定，就是出自这个道理。

我想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错杀了就不能复生。后来有人评说我对此案是“刀下留情”，我却解释说：“这不是我‘刀下留情’而是本着党的政策原则，实事求是，作出‘刀下留人’，再经复查处理的实况。”以后我住医院，在同一病房里，听到剑阁住院病人及其亲属，多次谈到家乡何禹生，在刑满出狱以后，勤劳生产又在公兴乡以商为业，并且常常谈到党的政策英明，也赞誉我严格执行政策，使他得有今日幸福。

张荣福记录整理于绵阳

1988年6月26日完稿

接管剑阁金融机构及建立人民银行

张 鸿 春

一九四四年我在教书期间，就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一九四六年于山西冀南洪洞县银行工作，后任赵城县支行副经理。一九四九年解放大西南的时候，党领导调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区工作，我被编入南下财贸大队，是年十一月，我们由宝鸡步行，到了溜坝才坐上汽车，驶入四川。在剑阁专区所在的广元休息了几天，财贸大队的七个同志，留在广元任银行干部，这时我任川北银行广元办事处的督导员。办事处分两个工作组，前往专区所辖各县，接管银行事务。我和张福昭（现名张云峰），先到剑阁后去江油，完成接管任务之后，又返回广元，过了在新解放区的第一个春节，一九五〇年五月，张福昭分往江油，我被分到剑阁建立人民银行。

剑阁在解放之前，就设有省行剑阁办事处和剑阁县银行两个金融机构。我们在接受剑阁金融机构时，就留用了原省行办事处的陈家犹、张泽民；县行的李汉三、魏可行、李廷樞等人，继续从事金融工作。接管中原银行财产无损，库存券额票面数字与银行帐目相等无误。银行原有的武器、家俱也与档案所载的情况相符，这对我们恢复与发展金融业务来说，算是有利条件。

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剑阁支行时，我任行长，初间社会秩序尚不安定，行里的工作人员，白日夜晚，轮番值勤，时时提高警惕，保护国家财产，注意安全。当时人民群众的观念上，对旧法币中的金元券、银元券还有深深的余悸，很不信任纸钞，只信任银元、镍币、铜板一类的“硬头货”。尽管我们大力宣传人民币是新中国的法定货币，它可以按等值兑换银元；它在市面上流通使用，是根本上不同于国民党的金元券、银元券那样不昭信用；它是有保障的与银元一样同等价值，且具有携带方便，促进市场交易，发展生产等功能。但人民群众在使用人民币上，还是持徘徊状，甚至暗自拒用。市面上的交易不是讲银元、镍币、铜板，就是以物易物。面临人民币难以发行，又不易兑换银元入库，银行工作人员又少，开展工作自然难度很大的情况下，一九五〇年四月，上级通知决定停止使用银元、镍币，在各个部门的配合下，银元兑换人民币这一业务，活跃起来，市场上使人民币的情况，才逐渐流通。

这时党和政府工作，急需办理的真是千头万绪。安定秩序、稳定物价、发展生产、繁荣市场皆是重要事项。特别是征粮、支前、供给遣散国民党官兵回往原籍安居落业、宣传抗美援朝及征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等等，中心工作一个紧接一个。我们银行在人员少，事务多的情况下，结合中心工作开展业务活动。当接管委员会白宇清同志将接管剑阁原有财、税部门的帐目、财产分别移交有关新建单位后，我们银行和贸易公司、税务局合建党支部，相互配会下开展财贸工作时，财、贸、税才各自走上工作正轨。

剑阁人民银行开业，首先就是通过兑换银元、镍币、铜

钱和兑换国民党的金元券、银元券来发行人民币。宣传一律使用人民币，市面不准银元流通、不准以物易物。接着深入市场、深入农村，调查了解商业情况；了解粮、棉、肉、油、布匹等主要物品价格情况。为力求全县范围内，各主要商品价格大体平衡。再根据各种价格计算折实单位，确定职工工资、福利标准，按时公布折实牌价，都有过一段艰苦的努力。

为发展生产、繁荣市场、搞活经济，随着宣传党的政策，了解城市市场物价情况的同时，对一些小商小贩，进行发放贷款，鼓励经营；协助小手工业者发展生产；扶植城市、场镇组成工商联合会，开展对私营工商业，既有限制又要搞活，从而达到市场繁荣兴旺的局面。

在进行上述业务活动中，人员不够分配，后来川北分行分来西南革大刘玉涵等四人、川北革大雷汉高等十五人，又陆续接收农村工作积极分子，使全行共约五十多人，分别担任不同工作。有的留在机关办事，有的下乡推动业务，总的来说都是积极认真、艰苦努力地进行工作。机关开始兑换金银首饰时，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没人能识别金银的成色，无法按质（值）兑换人民币。好在我们在做群众工作上，有着一定的成绩，县工商联合会知道我们缺乏熟手识别金银，便推荐了一位可靠的外籍客商名叫陈伯达的商人，前来帮助我们鉴别金银、首饰的成分，使我们能在兑换工作中，准确无误地按等值评定价格，公私两得互不吃亏。

随着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运动，乡、村农协会纷纷送来各种银锭、大宝、银元以及各类金银首饰，我们概能及时按质按价兑换成人民币，交与来人，带回现款分给贫苦农民。在

此，农村经济活跃起来，农民生产条件改善，既有分得的土地耕种，又有耕牛、农具使用，还分得一些现金。生产、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当家作主的观念增强，干啥都有积极性。因此，人民币的信誉提高了，市场交易活跃起来，银元也就自然停止使用于市了。

为了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我和本行的同志们，多次分头下乡工作，身背被盖、脚穿草鞋，爬山涉水，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的风吹雨淋，也记不清打上火把走过多少夜路，往返城乡之间，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在我来说剑阁的各区各乡我都是走过了的。情况一经摸清，根据缓急所需，银行先后在武连、开封、元山、金仙、白龙、江口及至最后的下寺等场镇，建立了营业所。这些营业所，除接待兑换金银直接介绍到县行办理外，其余业务如发放小商小贩的货款、发放农村互助组的各项贷款、扶植工商联合会、活跃市场经济等都是直接办理，而且营业所与营业所都相互竞赛，谁也不甘掉队。

县行为了稳健地开展金融业务，随时发现典型，总结经验教训，特办《剑阁金融简报》，每周发刊一次，送达区乡，既解了当时乡村电话不通，情报交流不便的困难，又及时广泛解决基层工作上的一些疑难，并且提示注意避免发生某些问题。对先进工作者及先进事迹，及时总结成绩，予以表彰，带动后进，帮助后进。

由于我常在农村往来，深有实地感受，颇知基层工作同志的辛苦勤劳，每当工作同志定期或不定期，从乡间返回机关汇报情况，和参加会议，除了向他们一一问好外，并亲手与同志们打水洗脸洗脚。到厨房为他们照料菜肴，力争吃饱

吃好；如果是节假日加餐，特别从优的照顾从乡下回来的同志。席间他们常常再三地敬我吃肉，尽管我是不乐于吃肉，但他们的热情难屈，我也免强接受。

我在剑阁期间，无论是机关、农村的金融同志，个个干劲十足，大家都能通力合作，严格遵守“错帐、错钱不过夜”、“金银及时入库”的规章制度。一九五一年秋，川北分行在南充召开各县支行行长会议。当时川北区是好几个县，在这次行长会议上，全区有两个县荣获金融工作红旗县的光荣称号。其中剑阁支行在金银归库，人民币占领市场工作上，数川北最好的县，区乡送交支行兑换人民币的金、银及其各种首饰也较其他各县居多，且成色多在“9.8”左右。所获红缎锦标，规格大概是80公分×165公分，金字书写：

奖给 中国人民银行剑阁支行

认真负责，亲自动手，
超额完成任务。

中国人民银行川北分行
一九五一年度

一九五二年九月，我离开剑阁到蓉，深有回味一两年前，我为剑行军事代表，在接管剑阁金融机构，建立人民银行，及结合当时各项中心工作，恢复与发展金融事业中，与当年接管山西洪洞、赵城比较起来，剑阁的经济是较为发达的。群众工作也不难进行，各项工作只要群众一经发动起来，都能积极响应。譬如原来我在老区参加征兵，两月的工作进展，只征得五人参军，其中还有两名出了乱子。可我到